



中国
文学思想读本

原典·英译·解说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美]宇文所安 著 王柏华 陶庆梅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

原典·英译·解说

[美] 宇文所安 著
王柏华 陶庆梅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by Stephen Owe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92. Copyright © 199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原典·英译·解说 / (美) 宇文所安著；
王柏华，陶庆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
ISBN 978-7-108-06328-1

I. ①中… II. ①宇… ②王… ③陶…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
研究—古代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1173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5-608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55

字 数 762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2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三联版序言

宇文所安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英文本出版于1992年。那一年它其实已经十多岁了。关于本书的起源和成长，我已在初版序言中有所描述。此书在西方一直不无读者欣赏，但它在中国找到的读者显然更多。它已移居中国，入籍为中文图书的一员，或许还带着一点口音（虽然王柏华和陶庆梅已经相当出色地教会它说中文了）。

此书是我当时在耶鲁大学教古典文学理论课的一个产品，这门课的内容其实仅限于欧洲传统。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的“内部”工作，靠的是中文著述，它们基本上用中文术语解释那些思想文本。《读本》是一个尝试，它试着采用沉浸于欧洲文学思想传统的读者所能理解的术语来解释中国文本。熟悉欧洲文学思想传统并希望了解另一种传统的学者现已几乎不存在了，不过，总有一些感兴趣的人会有所发现。

我时不时会收到一种电子邮件，来自某个素未谋面的人，既非教师，亦非学生，只是一些有问题要问的成年人。几周以前，我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以下是大致内容：“几年前我见过一本您的书，是在书店里；我不记得书名了；里面有一篇11世纪的（应该是10世纪的）关于诗歌的作品，标题和作者，我都不记得了。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那本书的书名，还有那篇作品的作者以及标题？”显然，他想问的是《二十四

诗品》。这一类邮件我有时无法回复，但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回复一下。最令人吃惊的是邮件的开头：“几年前我……”这个记忆已经悬在那里好几年了，直到一天晚上，他终于决定给作者发一封邮件，非得把那个卡在记忆中的东西弄清楚不可。

我记得在杭州西湖的苏堤上那些钓鱼的人。每个人都守着十来个钓鱼竿；时不时会有一条鱼咬住十个钓钩中的某一个。我当时很是惊奇，因为我年轻时钓鱼总是用一根吊杆。或许我们全神贯注地守着钓鱼绳，其实并不那么在意能不能钓到鱼。不过，若是真想钓鱼的话，使用十个鱼竿显然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

如今我在外面有十多本书，时不时会有一本书“钓”到一个读者。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垂钓。如果中国读者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我的阅读方式吸引，那自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垂钓。若是没有一条鱼被吃，那自然也没什么坏处——它不过是一个网络中的一条线而已，那个网络形成了我们的日日新而复杂的思维方式。那个为了司空图给我发邮件的人在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想着中国，而是想着诗歌。不知不觉中，司空图已成为他如何思考诗歌的一部分了（我猜想他可能是个诗人）。如果我的中国读者在我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的阅读方式中有所发现，我不相信他们的兴趣来自“外国人是怎么想的”，我宁愿相信那是他们自己也能看到的東西。

我日复一日阅读中国文学，如此已过去许多年，我不认为我还能代表纯粹的“外国人”。我也不假装自己是中国人。我活在那个多重关系的网络之中。我发现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栖息地。我们都住在那里。

2018年11月

中译本序言

宇文所安

自从《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英文本问世以来,时光已流逝十载,而当初我在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为教这门课程而着手这项工作,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当我开始这项工作之际,耶鲁比较文学系还没有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如今,耶鲁比较文学系已有不少学生专攻中国文学。当时,该领域的西语著作尚不多见;可如今已数不胜数了,其中包括《文心雕龙》西班牙语译本以及《文心雕龙》英文论文选。二十五年前,中国学者的《文心雕龙》著作书目提要只需要一页的篇幅,如今,一份最基本的书目提要几乎可以装满一本不太厚的书。《读本》一书首先是为了把中国文学批评介绍给学习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学生;但此书还有另一个目的——试图在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以所谓“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为主流,学者的任务是从文本中抽取观念,考察一种观念是被哪位批评家所支持的,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以及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观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这一类研究喜欢使用摘要和节选;如今仍有大量参考资料性著作从各种类目繁多的原始资料中寻章摘句。

当然,“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不无优势,但它容易忽视观念在具体文本之中是如何运作的。《读本》不希望把批评著作处理为观念的容器,

它试图展现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各种观念不过是文本运动的若干点，不断处在修改、变化之中，它们绝不会一劳永逸地被纯化为稳定的、可以被摘录的“观念”。这种视文本为思想过程的观点可能有点让人伤脑筋，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像抓一个对象那样把它“抓”住了；可是，这样一来，一度被僵化的文本却突然间活动起来。而且，文本中那些看似多余的部分，也就是那些无法被批评文选摘录的部分，也变得有意义了、重要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论说文的完美可以达到“弥缝莫见其隙”，这是一个启人深思的说法。批评话语有时表面看起来完美无缺，似乎达到了观念和文本的高度统一；但文本自身是一个修补空隙、缝合断片的过程，它不一定总是天衣无缝。如果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活的思想。目前看来，如何理解活的思想仍是一个重要课题；而“观念史”只能告诉我们古人的思想是什么。

一个作品完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观察仔细，我们总可以看出其中的空隙或漏洞，空隙处漏掉了一些重要东西。《读本》一书也是如此。“漏洞”之一是许多重要作品没有被论及；有不少学者强烈要求我把这个或那个批评家或作品补充进来。我当然可以补充，但在本书没有讨论到的另外一部分中国文学批评中，我也发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漏洞。让我借用为本书中文本作序的大好时机，为未来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提出一些方向性建议。

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在“五四”时期开始成形，当时，作为研究方法的“观念史”成为该领域的明确特征。该领域越来越成熟，诞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许多原始资料经过整理有了权威的定本、汇编本，许多重要批评家都有了专门研究。在此阶段，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新事物，仅仅因为我们改变了观看事物的角度，也就是改变了我们要寻找的对象。

对于今天的学者，一个有前景的方向似乎是站在该领域外面，把它跟某个具体地点和时刻的文学和文化史整合起来。既然中国已经积累了

大量优秀的历史性研究著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简直可谓轻车熟路。我们应当从批评文本的功能上考察它们，看它们在具体条件下是如何被使用和重新被使用的，面对一本书，我们要问它为什么要出版，谁读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批评家与某种观念联系起来，为什么不把这个传统视为一个不断成长的各种观念和立场的总汇，以考察哪些观念和立场在某些具体条件下被抽取出来，并因为哪些条件的挤压而改变？“观念史”模式暗含一种发展主题，虽然不无道理，但它歪曲了文学话语在某些具体条件下发挥其功用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批评立场放到文化史的大语境中加以考察。按照一种“观念史”的视角，16世纪末17世纪初袁宏道等作家对大众文化的赞美似乎是新观念，虽然它植根于前人的价值观。按照“五四”时代文学史的说法，这是一种“进步”。如果把它放回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内部，我们会发现它是对16世纪明代复古思潮的反动。如果我们不是寻章摘句，而是通篇阅读，我们会时不时看到对乡村私塾和流俗之见的蔑视之辞，而这种情况在早期文本中并不多见。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文学教育在当时迅速普及的迹象——那些一度被精英独占的经典知识已变成了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转向大众文化就成了江南上层精英使自己区别于人数剧增的中层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文学理论在这里与社会史和物质文化遇合，这种较开阔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学”为何经常出现在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工艺精良的本子里。

提到“江南”，引出了地域问题，对于宋代以来的文学，地域问题十分重要。江南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以至于我们常常把江南地域文化错当成“中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充满地域意识的地方传统，尤其在四川和广东这样的地方，它们努力确认自己的地方身份，以对抗江南精英。历史学家关注的这类问题往往也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学者的好问题。对于由文本编织的过去，我们难免有一些固定印象，我们应该问一问，这些印象是怎么跑到我们脑子里去的。时代越古，这个问

题就越严重。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江南和魏的著名文论直接代表着那个时代。我们不应当忘记，曹丕和曹植的那些标准的批评文本是保存在《文选》里的，而且，曹丕的《论文》很可能节选自一部篇幅更长的作品，该作品是否全篇以江南为核心内容还不一定。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那些批评著述是曹氏家族和江南大师们编选的，被编选进来的还有大量其他作品。我们应当注意到，曹丕和曹植的被选作品相当不少，曹操的作品也有几篇。从梁朝对之前的三个世纪的再现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梁朝的情况。总之，我们对建安和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萧统及其臣子的动机的产物。我们的理解不但被他们的判断所左右，而且被他们的力量所左右，只有他们有能力保存文本并使部分文本成为经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脑中的建安和魏来自被梁朝的镜子照进去或被梁朝的摄影镜头拍摄进去的作品。

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标准叙述会因为这些研究视角的加入而变得复杂和丰富。

最后我要感谢王柏华和陶庆梅两位译者付出的极大努力。译书和写书所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辛苦经常不相上下。在中西对话的进程中，译者往往是无名英雄。如果本书值得一读，我们要感激的当是她们二位。

2002年

中译本前言

乐黛云

20世纪90年代初，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的“互动”。我了解的“互动”是从不同文化的视点来理解和阐释另一种文化，从而在不同文化的激荡和照亮中产生新的因素和建构。中国古代诗人苏轼早就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的意思是说，山的形态总是和观山者所处的地位与角度有关，人们要真正认识山的全貌只能站在山之外。但是，怎样才能真正找到这样一个“山外之点”来重新观察这层峦叠嶂，深邃莫测的中国文论之“山”呢？

当时也读了一些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书，认为他所说的批判—沟通—重建的发展之路也很有道理。他认为任何体系的构成，首先要“定位”，定位就是“自我设限”，也就是有所规范，无边无际就无法构成体系。但体系一经完备就会封闭，封闭就是老化的开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样，才有可能跳出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扩大自我，以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这种开放、融合就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也就是对原有体系的重建和新体系的诞生。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这种他称为“互为主观”的神奇的效果呢？

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无疑都已是十分成熟的体系。我想，如果都

是在原来的体系内兜圈子，就很难有突破和创新。即使企图用一种体系“融入”另一种体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曾认真研读过刘若愚教授的《中国文学理论》。这部著作从西方文论的体系出发，以西方的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为框架，对中国文论作了全面的对比分析，的确提供了许多过去未曾触及而颇值得玩味的论点。然而，正如我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的文章中所担忧的：“如果只用外来话语构成的模式来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摒弃在外，结果是所谓世界文化对话也仍然只是一个调子的独白，而不能达到沟通和交往的目的。”国内许多试图以西方观念阐释中国文论的著作也都很难超越这样的局限，结果只能是一种体系对另一种体系的切割和强加，互动就更谈不上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真正通过中西文论互动，使中西文论都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呢？

看来最根本的出发点必须改变，不应再从已成的体系出发，而应回归源头，从体系之所形成的那些原发的文学现象再出发。但具体如何做？如何才能在中西文论的互动中将这千头万绪的原始材料提纲挈领地加以再叙述和再评析？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顺理成章的突破口？我思之再三，却终于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好办法。就是在这样的困惑中，我突然发现了宇文教授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这是他为美国大学文科研究生全面讲授中国文论所用的“读本”。

看来宇文先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向美国学生讲解中国文论也是颇费斟酌的。他不大赞成刘若愚的办法，即把中国文学理论按西方的框架分为几大块，再选择若干原始文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他既不满足于像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所著的《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那样，从一个人的著作一直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也不满足于像余宝琳（Pauline Yu）的《中国传统意象读法》那样，选择一个核心问题，广泛联系各种文论来进行深入讨论；他创造了第四种方法，

在“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和“要么为照顾每一特殊文本的需要而牺牲连贯性”的两难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即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他的讲述采用统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说（不是概说）和对所涉及问题的评述。这就轻而易举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这样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致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经过了多年寻觅，我感到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我立即将宇文教授的《读本》规定为我们研究生班“比较诗学”课程的基本教材，要求学生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研读。教学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熟读宇文教授所选的文论选段的英文译文，从词汇—术语—表达方式—意义生成四个方面找出译文与我们自己过去的理解和以往中国学者的理解有哪些不同；第二步，要求学生将宇文教授关于每一段文论所作的讨论译成汉语，仔细研读，在研讨会上提出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看法，加以比照；第三步，在讨论班上（包括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中文系某些专业的研究生）展开广泛的讨论。我主持的两届比较诗学教学（每届一年）都用了同样的方法，参加者一致认为获益甚大，我自己也感到有很大提高。我想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从西方文论这一外在的语境找到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可以像从庐山之外观察庐山那样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久已熟知的中国传统文论。宇文教授是哈佛大学的校聘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是以汉学研究而获此殊荣的极少数美国学者之一。他有极其深厚的西方文化根基，对文学有十分敏感的鉴赏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文学又有很高的造诣。他对中国文论的观察和阐释显然是以西方文论为背景而形成了天然的互动。例如《读本》开宗明义第一章首段讨论的是《论语·为政》：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就我所知，众多文论选本、文论史、文学批评史都很少引证或分析过孔子的这段话。为什么宇文一开始就对这段话如此重视，并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分析呢？我想这正是因为如他所说，在西方理论中，无论模仿（mimesis）或再现（representation）都是由原物和被模仿物，或原物与被再现物的二元结构所组成，而孔子提出的却是一个认识事物的三级系列，西方的二元结构正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来考察中国的特殊认识方式；没有前者的比照就不会对后者产生特殊的敏感和关注。

第二，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多次往返的双向阐释中，会产生一种互动，让我们发现或者说“生发”出过去未曾认识到的中、西文论的许多新的特色。例如从上段引文中，宇文教授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文论出发点的不同：他指出柏拉图关注的是短暂、变化和偶然的具体现象如何将永恒、不变、自在的理念（Form）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世界的外表是欺骗性的，已经存在的绝对真理隐藏在欺骗性的外表之下。希腊文“诗”一词（*poiêma*）源于“制作”（*piein*），意谓诗就是要把“已在的”、隐藏在内的“理念”按照已有的模式“制作”出来，使之得到认识。孔子所强调的却不是任何“内在”“已在”的不变之物，而是从“人”出发，先去观察一个人是怎么回事（“视其所以”），再看他何以会如此（“观其所由”），最后还要考察他安顿于何处，从而找出他的目的、动机和所求（“察其所安”）。如果说西方文论是要引导人去认识一个“已在”的概念（理念），那么，孔子的学说却是要引导人去认识一个活动变化着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都在不断变化，认识的结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成”的东西（Things become），而是随机形成、变动不居的“将成”之物（Things becoming）。宇文教授认为“中国文学思想正是围绕着这个‘知’的问题发展起来的”。“它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的解释学，正如西方文学思想建基于‘诗学’（就诗的制作来讨论诗的概念）。”宇文教授指出：“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而西方文学解释学则

产生于它的诗学。”这两句话照我的理解，就是说，中国诗学是从外在的样态（所以）和历史的因由（所由）去洞察某种内心之所求（所安）；而传统西方理论则是从任何现象中都必然存在的本质（理性内核）出发，去逐步探察现象是如何形成（制作）并何以会如此形成的。大而言之，西方哲学体系强调的是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上的绝对精神，确定不变的理性；而中国哲学传统强调的是：“有物混成”，认为世界万物都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因种种机缘，而凝聚成一种现实，这就是所谓“不存在而有”。宇文教授认为在中西不同的文论传统中，“都是最初的关注点决定了后来的变化”。两种传统都是要发现隐藏在表面之后的东西，但由于上述出发点的不同，两种文学思想也就分道扬镳了。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不同语境中的双向阐释使过去长期习以为常的特点得到重新认识，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种在区别中的互见、互识，互相照亮，以及可能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显然会为未来的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

第三，宇文教授的教材最使我心悅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往往在本人对材料的精细解读中融进了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的观点，将他自己对中国诗歌的精读经验自然带入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之中。他还特别留意那些传统文论和传统文学史研究所无法包纳、无法处理，但对文学发展实际上具有巨大潜在推动力的东西的表达。他引证刘勰的话说，论说文的完美可以“弥缝莫见其隙”，而我们恰恰应看到文本自身从来是一个“缝合片段，修补空隙”的过程。只有看到这些缝合和修补的痕迹，才能了解作者创作时的真正活泼的思想而达到孟子所谓的“知言”。这样的例子在《读本》中几乎俯拾即是，特别在《文赋》《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和有关王夫之的讨论中更为突出。

总之，《读本》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好范例。我们接连两年在两届研究生班中，对宇文教授的教材逐字逐句进行了研读，学生和我都得益甚多。当年就有一位研究生以读宇文教授的《读本》所得并和宇文教授讨论为题，写成了自己的硕士

论文，并和宇文教授取得了直接联系，她现在美国俄亥俄大学继续以此为题攻读博士学位。当年班上的高才生王宇根先生考入哈佛大学，成了宇文教授的及门弟子；另一位高才生王柏华女士就是本书的主译者。她曾申请到一笔基金，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半，直接受到宇文教授的指导，完成了这项难得的译作。王柏华对此译作费尽心血，一丝不苟，多次反复修改；应该说本书的译者在当今翻译界实属拔尖的高手。

记得钱锺书先生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发表演讲，特别强调创新，反对“盲目的材料崇拜”。反对“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他认为必须从无尽无休的材料重复中解脱出来，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他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内学术研究界的症结。宇文教授的这本书虽然以解读为题，却同时又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极富创意的理论之作。我坚信它将从新的起点出发，推动整个文论研究向创新的方向发展。现在，终于有可能将这本 20 世纪 90 年代难得的精心杰作呈献于广大中国读者之前。我确信文学理论研究者、世界文学研究者、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国文论研究者，年轻的、年长的、传统的、现代的都一定能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

2002年2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序 言

本书目前的规模是始料不及的。让你的课题再等上几年，待它确实成熟了，醇美如陈年佳酿，然后再亮相，这的确是个明智之举。然而，还有一种课题，它们俨然老科幻电影中的怪物，碰到什么就吞吃什么，疯长不停。我得承认，本书原想追求“琢磨之功”（*labor limae*），也即贺拉斯所谓“铍工活儿”，它润色文字，像雕刻家打磨石头那样；然而，事与愿违，很多时候，读者看到的不过是斧头留下的粗活儿，奇形怪状的石块儿时不时被砍下来，即使砍下来，还是不停地长。它们四处堆积，好像带着什么悬念，跳动着，积聚着；不管怎样，希望一经付梓，所有从母体上掉落的材料终于可以网罗殆尽。

本书缘起于十二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讲授的一门课程，当时，我天真地希望把中国的文学理论展示给学习西方文学的学生们。在授课前的那个夏季，我发现我所做的翻译工作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打算。在此后的十年间，翻译和解说的手稿继续增长，直至现在的规模，俨然一个有组织的噩梦。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它仍算不上完备：它不但遗漏了若干文本，而且已入选的文本也没有得到充分解说。我以“阅读……”为书名，以避免给读者一张空头支票：它不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全部重要文本的一个纵览；它甚至没有囊括足够多的文本以提供一个连续体，尤其是后面部分。我仅能保证，这些被选入的文本，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是重要

的或是有代表性的。而且，汇总之后，它们尚能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我的同事不断对我说，“你不能漏掉X”；可是，抱歉得很，我确实漏掉了X，而且，被漏掉的还远不止X。正因为意识到这些疏漏的存在，我让本书保持一个开放结构，把若干里程碑妥当安放在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中。有了这个开放结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本人或其他同道便可以随时填补空缺了。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若干年来参加我的各种中国文学理论课程的学生们，感谢他们。此外，我还要感谢台湾大学的柯庆明，他耐心地与我一道审阅了开始几章的草稿，指出了我的若干错误和一些颇为无礼的判断。第二轮指正和建议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余宝琳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魏世德。魏世德教授提出的大量看法，远远超出了读者的一般义务，使我受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有古根海姆基金（Guggenheim Foundation）的支持，以及美国学术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提供的一点额外资助，没有它们，这个庞然大物就无法完成。在手稿准备交付排印之际，我的研究生助理 Eileen Chou 为本书提供了汉字，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谢谢她。像往常一样，我要感谢的还有我的妻子 Phyllis，感谢她一直忍耐着这份过长的劳作，还有我的牢骚。

1992年